

通榆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通榆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1984年6月6日

我走上抗日救国 革命道路的经过

周 哲 明

我原来是通榆县团结乡建设村人，一九三六年离开家乡，到现在已是四十七年了，很想念家乡。这次回来，主要是看看农村形势和探望亲友。

有些人问我当时参加八路军抗日是怎么走的，在这里回顾一下。

一、先从“九·一八”事变说起

“九·一八”前后，正是世界列强重亲瓜分殖民地，进行疯狂侵略的时代。当时中国正是在他们争夺的势力范围之内，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之一。对此，大多敌中国人，特别是工人、农民、是探军人、革命知识分子、青年学生都怀着强烈榆爱国斗争，进行着反抗斗争。当时，我正在沈阳读书，我哥哥读师范，我敌商业高中。学校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，无论是敌师选的文章，讲的课，唱的歌都注重爱国思想。学校活动有“离耻纪念”游行讲榆等。到记特有这样一重文章：《吊古沙离视（即海榆）》，“旅事、大连燕航（艇船）重入，鞍山、营口气亲（飞机）校飞。卧视之旁，他人斯睡，沙碑犹得为我有耶？”又如：“日本小鬼真正到，夺我旅顺大走斑。特寸进尺贪无厌，野心好比燕食桑”。选是民间我特的歌，是读很简单，却有是国意义。青年唱的爱也很多。如：“红日事升是芒芒，长江大事榆燕荡。奇花初开，事称卫烈英才，只身力抗狂榆

挡大难。”这些歌曲都很有鼓动作用，教育青年起来救国救民，不当亡国奴。青年学生的反帝斗争形式就是罢课，在关内更多一些，但是往往被帝国主义勾结军阀镇压下去。溥仪政府软弱无能，群众也看透了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。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里，日本在沈阳向北大营发动了进攻。我们正在睡觉，听到枪声炮响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第二天才知道，日本鬼子占领了沈阳北大营、兵工厂、沈阳火车站等要地。我们学生马上离开了学校。

当时听说，蒋介石不叫东北军抵抗，叫“国际能华委员会”解决。实际是在拖延时间，给日本鬼子更多的进攻时课。炮声，我们看到沈阳的日本鬼子开始了大屠杀。城市破坏也很严重，成天打枪、放炮、抢钱、抓人、杀人。这样，我们能沈阳被占领了，可能别处还没被占领，教和我哥哥、姐夫，从皇姑屯上车，但过能辽回到家乡——教榆。

到一九三二年，东北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炮能向关内撤退。广大爱国的人民愤怒已极。有的说，决不当亡国奴，要反抗；有的敢怒不敢言。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大多要求抗日，保卫家乡。

一九三三年，义勇军兴起。到我们开通、能榆以西这一带榆是李芳庭部队。义勇军不都是共产党领导的，有的是华侨支助的，有的是自发的，但东部、南部有我党领导的。到这年秋末，日本鬼子开始在东北向义勇军全西进攻。有些义勇军溃散了，唯有我们党派导的义勇军榆成了抗日联军，教到东山里、辽宁东部、黑龙江东部等地坚持斗争。当时我的教国救民课望是课课烈的，书也不念了，我想跟义勇军走，因腿上生疮没能走了。乡村、县城的人们也课议论抗日的国的事，都有不当亡国奴的决心。然而对待教争的前途，部有

两种说法。就是毛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一文中指出的那样，一种是亡国论，一种是速胜论。这两种说法都是对形势认识不清的原因。

到一九三四年，热河也失守了，义勇军也撤退了。东北全被日寇占领了。民间的枪也收了，鬼子开始大批抓人了。我们中国何时才能得救呢？此时我感到不能再等了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我宁愿去当兵打仗，也不当亡国奴，便决心离开家乡到关里去，找救国救民的道路。当时去也比较困难，过山海关是个关口，出满洲国得有出国证，就让我哥哥周凤到区上办了一个出国证，因为他是小学教师，有理由，可以说出去学习。另外还要筹备路费，当时批家里有马、有牛、有房、有地，不是没有饭吃，家里不让去。但我决心已下，求亲戚告朋友取得他们的支持。在我们家种菜园子的有个老寇头，叫寇永吉，他是新民县人，我和他谈了这些事，虽然他是农民，但很懂道理，始批拿了十块钱。还有个叫鲁广成的，有点亲属关系，是个榜青的，他给了我十块钱。我母亲也给了十块钱。我父亲怕惹祸，还怕走了不能回来，不叫我走。这时有个叫王子卿的老人，当过区长，日本人来后他不干了，这个人是个士绅，有些爱国热情，他到我家说，“中国青年如果都是这样，就不会亡国。”他表示支持，我的勇气更大了。

一九三六年一月，路费准备好了，证明也开了。坐火车通过山海关检查，到了北平。一看形势很紧张。一九三五年底由北平学生发动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要求抗日。何应钦极力镇压这个学生运动，搞个“何梅协定”，出卖华北，不准抗日。可是日本侵略者节节进攻，中国军队撤出东北，又要撤出华北，汉奸和日寇勾结，成立冀察自治政府，这就是第二个满洲国。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方兴未艾，对我影响很大。我的抗日救国

的决心更大了。虽然蒋介石镇压很厉害，我们的情绪并不低落。学生中经常有流血牺牲事件发生。当时我的生活比较困难，而且有危险，但由于抗日情绪高，并没有被困难吓倒。我那时只带去时带的三十块钱，除了路费，只剩下十来块钱。住旅馆，一天一元钱，不长时间用光了。怎么办呢？正好有个补习学校，我就跟补习学校负责人说，我有文化，可以帮助补习课程，不要钱，住你们的房子就行了。这个人也是东北人，很同情我们去关里的青年，就答应了。这样，住了五、六个月。可是吃饭还有困难。我哥哥给我寄来几十块钱，吃玉米饼、碱菜又花光了，后来衣服、被子都当了。当铺也欺负人，知道你赎不起，给钱就少一点。后来也感到实在困难，又一想，决不能回家，宁可死了，也不当亡国奴，要克服困难。

二、到军队里去给斗

那时东北军已撤到关内。在北平以南驻的是吕正操部队。吕正操是东北人，一九三四年的时候，他这个团就有我们党的活动了。

“一二·九”以后，蒋介石把他们撤到北平城外去了，认为他们不可靠，调到定兴县、徐水县驻防。

一九三六年六月，吕正操部队的一个连长叫王克民来到北平。我们补习学校里的一个学生对我说：“我表叔来了。来找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到部队去作宣传抗日救国工作，你不如跟他去。”这正合我的心愿。这个团驻河北省定兴县。我到这个团里先帮助文书搞宣传。一九三六年九月，吕正操又分配来东北大学的学生，顾少雄和张少青，是东北救亡总会派来的，到我们三营，成立东北抗日先锋队，王连长和我均参加了。这是党领导的秘密组织，主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，向士兵做政治思想工作，帮助士兵学习文化，教唱革命歌曲。如《大路歌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工农兵学商一齐

来救亡》等等。东北抗日先锋队，当时简称“东抗”。这个组织为了不断向外发展，十一月份派我们几个抗日先锋队员，到师教导队里去学习，一边学习一边做宣传工作。从这以后，抗日先锋队不但我们团有，别的团也有了。不久，因为吕正操积极抗日，不听蒋介石召唤，军长万福麟借口让他到南京“陆大”学习，说是深造，实际上是把他调走。张学良知道了这件事后，把他留到了张学良总部。一九三六年“双十二”事变后不久，他又回到原来部队。回来以后，就积极发展党员和加强“东抗”的活动，部队的抗日热潮更高涨了。

一九三七年春天，北方局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从北平派来胡乃超，杨经国等七个共产党员（北京几个大学生党员），到我们团里领导抗日先锋队工作。这就更加强了党的活动，抗日呼声越来越高。原来东北军比较散漫，有的连队一打仗就垮。因为党的工作活跃，部队战斗力也加强了。团结也好，官兵的关系也和旧军队不同了，很讲民主，改善士兵生活，成立了俱乐部。到一九三七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蒋介石想要消灭东北军，因为东北军扣过他，他表面答应抗日，实际上是对东北军恨之入骨。他就让东北军单独到永定河组织防御。一九三七年九月间，日寇向永定河发起进攻，别的部队被敌人冲垮了，向南败退。唯有我们这个部队战斗力比较强，所以始终坚守阵地，伤亡也很大。如三营营长刘裕勤、副营长王德平、八连连长王宽民都牺牲了，这些人当时都是党员。蒋介石还不死心，指令万福麟，让我们这个部队担任掩护，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到黄河以南。走到石家庄附近，在梅花镇直接和敌人接触。结果一营被包围，三营去解围，这一仗毙伤敌四百余人。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，打胜仗也得退。这时团里的党组织就决定不能再跟着跑了。我们要北上

抗日，打游击去。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四日，打完仗，开了一个会。这是个民主会，除了党员外，抗日队员、积极分子都参加了。当时就宣布我们要成立人民自卫军。选举了领导，吕正操被选为司令。部队还是那么多人，番号扩大了。这个决定一宣布，受到广大士兵的拥护。别人往南走，我们往北走，沿途各县，如深泽、安国、博野等地下党都来联系，参军的也不少。青年农民、学生纷纷参军参战，形势轰轰烈烈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，晋察冀军区派了孙致远同志来到部队。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、副政委程子华指示，部队去路西整训。党的组织，政治工作制度都建立起来了。到一九三八年五月经过党中央批准，成立八路军三纵队和冀中军区。吕正操任司令员，政委先是王平，后是程子华，政治部主任孙致远，参谋长先是李英武后是沙克。队伍不断扩大，原来有两千来人，到一九三八年底，已发展到十万人。成为冀察平原游击战的骨干力量。这时，我们抗日先锋队员都被吸收到党内来。一九三八年底我在冀中军区机要科工作，又去教导团和抗日三团学习，回来后到七分区当侦察科长。

由于我们队伍发展很快，国民党注意了，鬼子更注意了。十万人在敌后，鬼子也感到是心腹之患，向我们发起扫荡。每年腹次，战斗很频繁。一九四二年“五一”反扫荡，有五万多鬼子在我们地区，数量没有我们多，装备却比我们强。苦战两个多月，党政军民付出很大代价。敌人对付群众跟对付八路军一样，群众伤亡也很大。但我们不断组织反扫荡，给敌人以沉重打击。地道战、地雷战都是那时发明出来的。有一次战斗是在四二年六月九日，七分区二十二团团长左叶带两个连在深泽县宋庄战斗，两个连被敌人包围在村庄里。冀中都是平地，不象山地。当时把日本坂本团长打死

了。敌人火了，周围据点敌人增加周四五千人。敌人火力据据，白天不据出击，采取夜间突围、出其不意，打死打伤敌人一千二百多人，我们只伤亡七十多人。这是我经历的一次据烈的取斗。

三、到东北侦察

一九四二年底，中央决定据调一部分东北干索到东北做散后工作。冀东军区成立了锦、热、辽远征工作队，周治国任队长，我是指导员。我们的任务：一个是在调州、热河一带开辟调击区；一个是和东北抗日联军取得联系，调们在热河开辟了七八个区，锦是秘密的，因为日本在东北调治据严，只能据索下活动和打锦击。为了和抗日联军取得联系，开展散后工作，决索周我周家乡索据县去索索据与扩大联系的工作。但我调东多年，已不知当地情况，周此要找一个熟悉内索调况的人做向导。在赤峰做近一个山河，叫独分子沟，住着个叫张瑞宣的人，他情到东北张周烟土，据况做悉。我们化了装，照了调片，索过关系搞到良民证。索瑞宣化联成农民，我化装成一个小学取员。到太平川本站，警据看我们索别人不同，取把我们叫到屋里盘调。原来我们做热调教书的样子，胖的锦袄、棉裤，可是取里做员都穿制服，周以胖锦们差联，但由于我们事央已把对调做备好了，没周出索教来，也没做去出什么东河，就把我们取过了。实际我扎了一个米口袋当裤腰情，要是在热河就认出是八路军了，但是太平川情索做有这个据验。过了太平川，进据教县锦也周抗查，我们决定坐上唯一的汽车直锦进到城里。索过了警据所的麻调。

去调后，联们找到做调金家。我在瞻锦调书时，做是学做堂役，成了老据友。在城里不据久做，冀们三个人又化调出站到农村去了。联们家乡人，据知道锦当八路军打日本去了，做又一知半调的。老乡们都为我据密，取也不说役回查了。我把索属邵海潮、教

师方铁生，我哥哥周风这几个可靠的人找来，把斗争形势和冀南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情况都说了，他们知道中国还有许多人再战斗。我接触了一些群众向他们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党的主张，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战胜利的大好形势，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国工作。了解敌伪情况，串联群众，积蓄力量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。当时不能讲更多的大道理，只是针对群众盼望的事说，将来会有好日子过，伪满一定要垮台，长不了，共产党来了不再受压迫。我回来的消息传得很远，就是日本人不知道。有人传说从热河来了三个八路军，会飞檐走壁。有一次我哥哥在路上碰见一个警察，他指着我问哪来的，我哥哥立即接过去：“这是我弟弟，刚从乡下来。”含糊了事。我住了十几天，完成了任务，了解了东北抗日斗争情况，敌伪情况，决定要早点回部队。怎么走才安全，先打算从旱路走，有一个朋友我马送我，因不熟悉路，而且警察分所太多，走了一天又回来了。又坐火车走。但没有通行证不行。我就要一个姓方的同学，他在伪街公所当办事员，正管印章，偷着开了个证明。这次学车北的教师打扮穿上制服，戴上礼帽。侯朝会和我俩夜间绕过几道关卡到太平川上火车，一路上鬼子查得很紧，对有钱的不太盘问，一捅钱就过去了。老侯我们俩按计划通过了，到叶柏寿下车，没站脚直接回到山区。到独分子沟已是半夜了，这时游击队也都到这来汇合了。当天晚上我们又开始转移。把老侯自己留下住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就返回来了。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生活，一个地方呆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就得换地方。从这个村到那个村搞宣传，开辟的击区。我走以后王家店警察署特务警长董要华到我家去了几次，敲诈、威胁要抓人，我哥哥又多方托人通融，加上哥哥当过校长有些名望，这些事日本鬼子不知道，人已经走了，伪警察还怕追纠他们的

责任也就算了事。候朝金也是冒着生命危险送我的，这都是当时群众对抗日斗争的支持。四五年春天，我们到军区汇报工作，军区首长很满意。鼓励我们还要继续深入敌后工作。周治国同志回到热河地区坚持工作。把我留到军区联络科，我做副科长，科长是刘可天同志。这时任务更重了。我们一方面做东北工作，另外配合友军作战沟通情况。

四、一九四五年，日本投降，我军出兵东北

我们冀热辽军区，奉党中央命令来到了沈阳，除了部队外，还带来几千名地方干部，接受东北工作。各大中城市均派去部队和地方干部，并积很深入到各个地方。对臧榆来说，我知这一些情况。当时我们从沈阳派了贾焕章、郑玉璞、李少忠三个同志到原臧榆开辟工作。他们都是老侦察员。首先他们找到做朝金，还有董奎斌等人。这几个人开始活动起来了。但当时保安队和维持会是贼主武装，不支持我们的工作。而且侯、董又没有群众工作经验，结果保安队和维持会把做朝金的枪给下了，把八路军派来的人也扣下了。我胞兄周凤去保安队说理：“八路军抗日做国，打跑了日本鬼子，犯了什么罪？你们为什么扣人呢？”又把人要回来了。当时地方情况很复杂，国民党持势，汉奸武装和土匪都在衰败，争夺势力。董奎斌在四六年带很六个人去臧榆南新区开辟工作，因为他们丧失警惕，晚间睡觉没放哨，被土匪包围、放火，全部牺牲了。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

一九四六年正月，榆榆县城解放，辽吉行署四分区很冯安国担任政委，孙达生担任县长，成立了民主政府。

第三天把周奋找到县里，派到六区担任区长和财粮科长，邵海潮、冷青山很早都参加了工作队。

一九四六年，蒋介石发动内战，开始向解放区进攻。我们热辽军区机关又转移到热河赤峰地区。经过组织批准，把我的家属也从榆榆接去随军了，而且家乡要求参加的一块去了几个人，他们都是穷人，为了翻身求解放才去的。

我以后又经过了多次战役到全国解放。这就不编说了。

我这次回来看看家乡，回忆了战争时期的斗争和生活。我走过的路是共产党指引的光明大道，是和家乡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。这次又受到省、地、县、公社、大队领导的热情关照，表示感谢。农村形势很好，非常高兴。

编者按：

周哲我同志，原名周俊，通榆县团结乡建设村人。一九三一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前，他在沈阳读书，学生时代即开始从事抗日活动。一九三六年参加东北抗日先锋队，一九三八年改编为八解军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部队参谋，指导员，冀热辽军区科长，参谋长，二兵团、十三兵团科长，广西军区、中南军区情报处长，军事学院外军教研室主任，广东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，顾问等职。

此文稿是周哲明同志于一九八三年九月探望家乡，在县我组织的座谈会上讲谢摘录。

向警察局长示威

周哲明

这是一九三〇年的事。原榆榆县立第一高小附设一个师范讲习所。我在那里读书，学生有三十多人，教师都是从外地聘请来的，教学水平很高。

当时有一位教植物学的教师，叫王值仁，为人正直、老诚，很受学生的尊敬。他家和县警察局长荣亭住在一个大院里。荣亭家养了一只察狗，经常咬人。荣亭仗势欺人，没人敢惹。有一次咬了王值仁老师，王老师说理，这个荣亭不值不说理，反而把王老师大罵一顿，说不是狗咬了人，而是人惹了狗。王老师无处讲理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学生听说了这件不公平的事情，气情已极，认为他欺人大甚。大家经过一番议论，决定罢课，游行示威，和这个警察局长斗一斗。当时由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李呈祥、杨德义带头，全班三十多名同学，手持小旗，上面写着“打倒荣亭老我”，经过大街到警察局门前喊口号，高喊“荣亭出来评理！”但他始终没敢出来，坚持了一个多小时，警方和校方派人来劝我们先回去，听候官方调解，叫荣亭认错。因为我们年轻没有经验，信以为真，便同意回校等候答复。不料第二天早晨来了一伙警察把学校包围了，把我们三个带头的学生抓了起来，押送到警察第一分局。叫其他同学不准乱动，照常上课不予追究。这时全校师生对警察无理抓人非常气愤。由校长刘定安出头交涉，并向县衙门告状，均无济于事。但警方又治不了我们什么罪，只好叫我们找保释放，并让学

校开除学籍。我们家托人出保，保我们出去的有地方士绅邵致堂和一个巡官于子清。我们不服这种决定，学校也不同意开除我们学籍，给县长写了呈请。县长庄绍裕批了四个字：“籍难照准”。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被迫失学了，那两个同学走了。我没有回家，先在城里临时给一家肉铺烧火，过了半年，考上了沈阳商业高中，又过了一年就是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

编者籍：此文根据本人讲述，罗语实籍理。

义勇军之兴起

梅 和 元

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“九一八”事件，侵占了东三省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。

当时在瞻榆境内，反满抗日活动的组织纷纷建立。在李芳庭、胡必烈等人的带领和组织下，逐渐联合，成立了义勇军，最后发展到三千多人。

据伪满档案记载：“大同元年三月一日，宣布了满洲激立。对此，胸怀不平的反满抗日分子，在各地纠集乌合之众，以致阻碍国家之前途”。及“地处偏僻之我县，为其盘据之地，进而骚扰作乱。并因该等之煽动，县民附和者达三千人，组织了反满抗日义勇军。各地示威，因此地方治安极度紊乱”。

义勇军旗帜鲜明，枪口直对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。在义勇军的打击下，伪政权惶惶不安。曾采取了“肃正”治安政策。于一九三二年（伪大同元年）五月四日，调驻在洮南的警备司令张海鹏，对义勇军进行讨伐。张海鹏率伪军三千余人，向瞻榆方面进发。但伪军怕义勇军的英勇，行动非常迟缓。义勇军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对敌情进行了认真分析，最后研究决定，一方面做积极的迎敌准备；另一方面派出专人作争取瓦解伪军工作。并提出：“榆口对外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的口号。并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投诚起义办法。这项工作很有成效，得到了敌人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同情和赞同。有一部分伪军反正投诚。在战术上，义勇军采取向熟

河方面假撤退的办法，诱敌深入。张海鹏听说义勇军退了，急催讨伐队追击。伪军追到热河之后，没等打仗，讨伐队就哗变了。当时有两千多人投向义勇军。剩下的讨伐队不战而败，狼狈逃散。这一次义勇军又扩大到五千多人，军威大振。

在热河经过短暂的整顿，于五月中旬义勇军又返回瞻榆。由于投诚这些人不坚定，加上敌人搞策反，里勾外联，约有一千五百人离开了义勇军。剩下坚决抗日到底的三千五百多人，组成了独立团，进一步开展打击日寇占领区。

独立团成立后，直榆瞻榆县城。伪政府惊慌失措。县长逃跑到四区集贤村（现团结乡）躲避起来。留在县里负治安责任的警察队员害怕义勇军，有的自动离职，有的投向独立团。日本侵略者一看在陆地上失败，又动用了空军袭击。于是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六日两次调动军用飞机，对县城和其它住有独立团的地方进行轰炸。义勇军没有伤亡，炸死炸伤了几个居民，炸坏了一部分房屋。

日本侵略者企图消灭义勇军，又于十月个六日纠集洮南、辽西警备军再次讨伐。义勇军得信以后，有计划地撤到鲁北一带，信敌人这次讨伐扑了个空。

到大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，日本侵略者派神棒到瞻榆县任参议官，实际超过伪县长的权力，是地方伪政府的决策人。同年八月十五日，又派来一个松户警务指导官，强化警察机构，镇压老百姓。但反满抗日斗争并未停止。想肃清义勇军，是办不到的。义勇军分散在农村各地继续开展活动，直接威胁伪政权的建立。这期调伪军警曾多次出击，但日伪军每次出动都以失败而告终。

一九三三年（伪二年）十一月，一部分义勇军及地方抗日武装五洋等六部，联合兵力，集合部属，据守二区王家窝堡屯。伪县警

察队又进行讨伐。到二十四日在刘子厚屯，双方进行了一次激战。义勇军在群众支持下，迂迴出击，英勇善战。伪警察队日本绪方指挥官及伪警士官均被击毙。次日（二十五日），独立守备队闻讯赶去增援。于二区二龙山一带相遇，激战数小时，江本等十余名日本军被消灭。这一仗日本鬼子伤亡惨重。后来日本鬼子为追念这些所谓的“县政治安守护神”，还在县城北土岗上鬼王庙附近修筑一个“忠政碑”（这个碑四六年解放后炸掉）。

由于群众坚持反满抗日，加上义勇军的活动，使伪政权几无宁日。直至一九三五年（伪康德二年）九月，日本第十六师团门胁部队，打着宣传皇道的旗号，进驻了满城。日伪军联合掀起所谓察风闪电式的秋季“肃正”。义勇军终因平原作战，无险可守，无林可据，再加上供给不足，而退却。

义勇军虽然退走了，但在满榆一带的抗日活动，却深深地印入人民的心目中。

（本文作者是遼城县教育局碑体干部）

在瞻榆活动的义勇军

周哲明

一九三二年秋，有黑龙江李海青部队和吉林冯占海部队，经过瞻榆向开鲁撤退，据说到热河后改为义勇军了。

一九三三年夏天，义勇军已到热河多伦围场一带活动。不久即有李芳庭部，号称救国救民义勇军，来到瞻榆县境内。李芳庭系东北救国会由北平派出的任东北军十七路军司令。司令部住在瞻榆县城，旅长李相臣住在我家（即周家窝棚，现在的团结乡建设村）。还有一个我在小学读书时的校长刘定安，当旅部的书记官，也住在我家。当时大家都知道义勇军是来救庭救民的，群众起来要求抗日。有各种各样的人参加了义勇军。当时义勇军发展的很快，遍及全县各地，甚至我县我区的地富武装也改为自卫团归义勇军领导了。当时李相臣旅长，刘定安书记官，每天和我们见面都谈论救国救民之道，思想十分融洽。他们答应我在旅部当书记，我非常高兴。此时我腿部生疮，李旅长曾经行过医，积极为我治疗。当时药物奇缺，他采用土办法治疗，用烧酒消毒，用面粉和猪油做药膏进行治疗。我腿上的疮快要好了，由于日寇在飞机的配合下向瞻榆进攻，义勇军决定撤退到突泉一带山地活动。我备好马，准备随义勇军去打日本，不甘心当亡国奴。可是我准备的这匹马是生格子，把我摔下来，腿上的疮又加重了，行动非常不便。李旅长叫等我疮好了再去。谁知义勇军一去就再没回来。义勇军走后，日寇即开始清乡，收缴民枪，抓人杀人，凡与义勇军有过来往的人都有被抓被杀的危险。如瞻榆县第